

# 隋突关系的恶化及影响

## ——以隋王朝的灭亡为中心

邱贤文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启民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对隋朝相当恭顺,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利益的冲突,两者关系恶化。东突厥对隋朝的政策发生改变,扶植了大批反隋势力,大量招来隋朝移民。东突厥这一政策变化对隋产生较大影响,也是隋朝灭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关键词] 东突厥 隋 灭亡

[中图分类号] K241

[文献标识码] A

隋朝极盛而亡,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学界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探讨隋朝灭亡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某一时间段下(启民可汗统治时期开始)的东突厥入手,探讨隋突关系的恶化与隋王朝灭亡之间的关系。

### 一、东突厥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各可汗中称强,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可汗,与阿波和西部达头等可汗之间既采取联合反隋的行动,又存在着种种矛盾。隋文帝在反击突厥的斗争中,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对突厥诸汗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策<sup>[1](P1331)</sup>。隋文帝首先遣使劝说与沙钵略有隙的达头可汗息兵,与达头和解。其后又利用阿波可汗素被沙钵略所忌,军事形势对其不利的时机,命长孙晟说服阿波与隋结好,以避免“致败”受辱于沙钵略。阿波听从长孙晟的劝说,向隋称臣盟好。接着,文帝又利用杨爽等军大败沙钵略兵于白道之机,对沙钵略敞开了结好的大门。沙钵略遣使朝贡求和,文帝厚待之,赐沙钵略爱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认沙钵略为大隋女婿。从此,突厥联合反隋的局面不复存在,其内部斗争加剧,沙钵略与达头相攻,突厥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从开皇十七年至十九年(597~599年),隋文帝先后以宗女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嫁突利(名染干,沙钵略之弟处罗侯可汗之子,时为东突厥小可汗),并封突利为启民可汗,而都蓝(名雍虞,沙钵略之子,沙钵略死后嗣为大可汗)不服,发兵进攻启民,启民败归隋朝。隋朝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后又迁启民及其所部于河套以南之“夏、胜二州之间”<sup>[1](P1873)</sup>。都蓝愤而发兵攻隋,隋以大军备之。都蓝兵未入塞,为部下所杀。隋文帝遣晋王杨广率军与启民联兵,乘东突厥各部势颓之际,出攻漠北获胜,“启民遂有其众”<sup>[1](P1874)</sup>。此后,隋朝通过扶植启民来控制漠北大部分地区。

### 二、东突厥与隋的关系

(一)恭顺时期。启民可汗对隋朝是相当恭顺的。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见隋“大陈文物”非常仰慕,“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率其属上表固请”。同年隋炀帝针对突厥已相当强大的现状,“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适时采取了北巡突厥以威慑四方尤其是东突厥的策略。启民可汗先后派他的儿子拓特勒和侄子毗黎伽特勒入塞,在途中迎接炀帝,甚至“自请入塞以奉迎,上不许”,于是召集突厥所部和室韦、奚等部族酋长齐聚突厥牙帐恭候,同时,还组织突厥民众,

修筑了一条自榆林达于突厥牙帐再到涿郡的“御道”,以奉迎炀帝大队人马的到来。隋炀帝于榆林临时搭建了可容纳千人的行宫,大宴启民可汗及其部众3500人,赐物20万段,并表演“百戏”。启民可汗为表臣服之心,上表请求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八月,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受到突厥君臣的奉迎,启民亲自“奉觞上寿”,数日后,炀帝率众南返,启民随同入边塞,送至定襄后归藩<sup>[2](P5629—5634)</sup>。

据上文所引可知,启民可汗曾两次“请袭冠带”,即改穿中原服饰,如所周知,北魏孝文帝改革也有此项内容,并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强力的反对。毫无疑问,启民可汗主动提出改穿汉服也必然引起其民族内部许多人的反对,但这也恰恰表明了启民可汗对隋王朝的政治态度。由上也足见启民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对隋朝相当恭顺之一斑。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不可能交朋友,只有相互的利益,启民可汗之所以对隋相当恭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切恨可汗(即处罗)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处罗”<sup>[1](P1877)</sup>。启民想借助隋朝的力量来消灭处罗可汗,完成其统一突厥的大业。隋朝国力强大,“阻击突厥,抚定西域,平定吐谷浑,清抚边服,略定西南,备御东北,讨伐高丽。”同时进行了海疆的经略,“征伐林邑,进军琉球”<sup>[3]</sup>。与隋朝的赫赫国势相比,东突厥要弱小的多,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表现出它恭顺的一面。

(二)恶化时期。任何区域性政治军事势力的并存关系,都含有一种彼消此长的运行规律。启民可汗去世之后,其子咄吉继承汗位,即始毕可汗,东突厥继续壮大。隋朝三次东征高丽失败,国内外形势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历经隋朝两代君主努力的借助东突厥力量建构的北疆屏藩格局岌岌可危,炀帝为了挽救这一格局,力图抓住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东突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可以从炀帝大臣裴矩身上找到一些证据,裴矩随驾参加第三次征辽,被特诏“护北蕃军事”,即专门监视东突厥始毕动向。裴矩认为始毕可汗羽毛已丰,部众渐盛,不太听话,便建策分其势,请隋炀帝以宗女嫁给始毕之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以事离间。但在实施中却未能如愿,因为叱吉设不敢接受隋公主,而始毕闻知后也对隋炀帝产生了怨恨。此后裴矩又向隋炀帝献策设计诱杀了始毕可汗的亲信大臣史蜀胡悉。<sup>[1](P1582)</sup>但始毕可汗并不会轻易上当,了解真相后对隋炀帝更加怨恨,因此不再向隋朝进贡。此后

不久对隋朝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袭击以示报复,此时炀帝正驻蹕汾阳宫避暑,东突厥突入岚城镇抄掠,将军范安贵讨击之,但吃了败仗,安贵战死,百司震惧<sup>[4]</sup>。

面对东突厥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又故伎重演再次北巡突厥试图重新确定与东突厥的友好关系。但是事与愿违,始毕可汗发动几十万大军将之围于雁门,至此隋与东突厥关系完全决裂。此后东突厥对隋朝采取了以下政策:

(1)扶植反隋势力。随着炀帝三次东征高丽,隋朝国内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起义军及地方官吏纷纷而起,开始反抗隋朝。东突厥对于日益削弱的隋朝,调整了自己的对隋政策,扶植了大量的反隋势力。

“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东突厥)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sup>〔1〕〔P1876〕</sup>薛举、窦建德等人都是隋末唐初风云一时的人物,这些势力是最强大的几支反隋力量,他们不得不北面称臣于东突厥,甚至代隋建唐的一代明君唐高祖李渊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如此<sup>〔5〕</sup>。东突厥除了扶植这些较大的势力外,还扶植了一些较小的势力:

白瑜娑

“灵武贼帅白瑜娑劫攘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谓之‘奴贼’。”<sup>〔2〕〔P5668〕</sup>

王须拔、魏刀儿

“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sup>〔2〕〔P5695〕</sup>

郭子和

“左翊卫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会郡中大饥,子和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有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sup>〔2〕〔P5724〕</sup>

刘季真

“(刘)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刘)六兄为拓定王,甚为边患。”<sup>〔6〕〔P2282〕</sup>

笔者查阅的文献有限,仅发现以上五股较小的反隋势力与东突厥有联系,但东突厥扶植的小势力当不只这些,还有一些因影响力较小而为文献所缺载。东突厥扶植了大量的反隋势力,通过他们来影响隋朝的政局,《隋书》甚至记载东突厥“分置官司,总统中国”,“俄属群盗并兴,于此(东突厥)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sup>〔1〕〔P1884〕</sup>此语虽有夸张成分,但也有实情在内,所谓的“分置官司”确有其事,受东突厥封号尚可考察者有刘武周“定杨可汗”<sup>〔6〕〔P2253〕</sup>、梁师都“大度毗伽可汗”<sup>〔6〕〔P2280〕</sup>、李子和“屋利设”<sup>〔6〕〔P2282〕</sup>、刘季真自称“突利可汗”<sup>〔6〕〔P2282〕</sup>。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李渊也受东突厥封号,但因史家“讳饰太甚”而不能得其详<sup>〔5〕</sup>。由上文所引不难看出,东突厥扶植反隋势力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既有农民起义军,又有地方官吏领导的反隋力量。另外,东突厥为这些反隋势力提供的支持也是颇有深度的。

首先,为某些反隋势力提供一定量的战马。刘武周起兵反隋,攻破楼烦郡,虏获了一些隋朝宫女,将之献给始毕可汗,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震”<sup>〔6〕〔P2253〕</sup>。李渊起兵之际派刘文静与东突厥联系,东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李)渊入关,多少随所欲。”<sup>〔2〕〔P5740〕</sup>李渊进军至龙门,康鞘利又送战马两千匹。

其次,直接派出军队。义宁元年(617)刘武周自称太守起

兵反隋,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围其桑干镇。刘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杀了王智辩,陈孝意逃回雁门。同年梁师都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即皇帝位,建国号梁,改元永隆。始毕赐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梁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同年六月当李渊起兵之际也派刘文静出使东突厥以寻求支持,突厥先是送马千匹来互市,后其柱国康鞘利又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

(2)大量招来隋朝移民。面对隋朝国内动荡的局面,有些人为了躲避战乱选择了向当时相对安定的少数民族地区移动,东突厥是他们主要目标之一。至于留居突厥汉人之具体数字,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证,但从历史文献中的些许记载我们仍可推知这一数字是十分巨大的。

史称“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东突厥)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夏。”<sup>〔1〕〔P1876〕</sup>

“大业之末,中国叛乱,华人奔突厥者甚众,其族遂炽。”<sup>〔7〕〔P1240〕</sup>

“此后隋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sup>〔8〕〔P5407〕</sup>

“是岁(贞观三年),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sup>〔6〕〔P37〕</sup>

“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杨)政道陷于窦建德,(武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至于牙所,为隋王。隋末中国人在虏廷者,悉隶于政道,有徒一万”<sup>〔6〕〔P5154〕</sup>。炀帝之孙杨政道到东突厥之后,处罗可汗立之为隋王,统领在突厥之所有汉人,有军队一万人,军队尚且一万,那么在东突厥之汉人数量粗略估计一下也不会太少。

贞观四年,唐朝攻灭了突厥,第二年“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sup>〔6〕〔P41〕</sup>颉利可汗战败降唐,唐政府出钱购买他及其手下所控制的汉人,数量尚达八万。

以上种种史料都表明在东突厥强盛之时,在突厥的汉人数量是十分巨大的,还有一件事从侧面向我们透漏了这一信息,李世民初即位(武德九年),“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sup>〔9〕〔P30〕</sup>“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世民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面对东突厥控制大量汉人的现状,他刚即位就要求“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值得注意的是在东突厥之汉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政治上失意而投靠东突厥,“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槃之谋,导之入边。”<sup>〔9〕〔P6069〕</sup>义成公主之弟杨善经<sup>〔9〕〔P6029〕</sup>、赵德言<sup>〔9〕〔P6034〕</sup>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分人对中原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对隋突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三、隋突关系的恶化对隋王朝的影响

(一)对隋末农民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突厥在隋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突厥与隋关系的恶化不仅使隋朝失去了强大的外援,而且对隋人心理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来。当李密到处流浪之时就曾游说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翟让,他对天下将大乱,“此亦刘、项奋起之会”,提出了三个原因,“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sup>〔6〕〔P2210〕</sup>。将隋突关系的恶化列与东征高丽、出巡江都并重的原因,可见两者关系的恶化对隋人心理上的隐性影响。隋朝是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乱之后建立的王朝,虽然它一度十分强大,但思乱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能改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乱的潜流就会表现出来。随着(转22页)



贡方物”记载。《日本书纪》中也有相关记载,因而此次遣使是被确认的事实,即为第三次遣隋使。

有了前车之鉴,此次日本政府在致隋的国书上特别注意,虽无不逊之辞,但据《日本书纪》所载,国书开头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sup>[9]</sup>虽然是以“天皇”和“皇帝”区分了两国统治者的称呼,但事实上“皇”和“帝”是一个意思,日本表达出了谋求对等外交的意向,而且千方百计的让隋朝方面承认,这封国书是否引起隋炀帝不满史书中并未记载。

小野妹子于第二年九月启程回国,但随行的八名留学生留学僧并未同时回国,其中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留学僧新汉人广齐在华十六年,留学僧新汉人旻在华二十五年,留学僧志贺汉人惠隐,南洲汉人清安学习了三十二年,留学生高向汉人玄理更是在华留学长达三十三年,直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才回国。这些留学生留学僧广泛汲取中原先进文化,回国后对于日本政治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这第三次遣隋使历史意义非凡。

关于四次遣隋使。《隋书·炀帝本纪》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己丑(二十七日),倭国遣使贡方物。”在《日本书纪》中并未有相关记录,在《隋书·炀帝本纪》中也只有这一句。此次遣隋使争议较大,因而传统四次说未将其计算在内,我们据《隋书》成书的年代及其记载的可靠性来判断,这次遣隋使也是有可信性的。

《隋书·倭国传》记载“(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sup>[10]</sup>610年被看作是最后一次遣隋使记录。然而《日本书纪》却记载“推古廿二年(隋大业十年,614年),甲戌六月,丁卯朔己卯,遣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于大唐(隋)”,<sup>[11]</sup>“廿三年己亥秋九月,犬上君御田稻、矢田部造至自大唐,百济使则从犬上君而来朝”。<sup>[12]</sup>从《日本书纪》对这此遣隋使记载的年月,使节姓名及返日的具体时间等信息来看,此次遣使之事应当属实。

(接24页)隋朝国内形势的恶化,民心已十分不稳,而恰恰在此时东突厥与隋朝关系恶化尤其是雁门之围,这对隋人的影响可想而知。东突厥扶植了一批反隋势力,对他们进行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派出军队,在冷兵器时代,少数民族的骑兵在野战中占有明显的优势,突厥的这一策略大大加强了反隋势力的力量。

(二)对隋朝统治者决策的影响。大业七年(611),也就是第一次征辽的前一年,山东、河北一带的民众已经开始反抗,加上三次征辽的失败,使隋炀帝的自信心大大受挫,到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再次北巡,没想到被突厥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骑兵包围在雁门,经过这次事件,隋炀帝残存的一点自信心又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面对北方强大突厥的威胁及国内鱼烂的形势,决定出幸江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理想国江都。大臣们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不少人希望炀帝能够“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之计”<sup>[13]</sup><sup>[P1189]</sup>。当炀帝准备出幸江都之时,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见四海土崩,恐为社稷之患”,劝谏炀帝说:“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隋炀帝大怒,将赵才下狱。建节尉任宗又上书劝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还西京,也被杀。到了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sup>[14]</sup><sup>[P5705-P5706]</sup>。隋炀帝一意孤行,南下江都,远离政治

不久以后,中国发生了隋末农民起义,公元618年,隋朝灭亡,日本负责派遣遣隋使的圣德太子也在公元621年过世,遣隋使的派遣由此也中断了。

根据以上分析,在中国隋朝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日本遣使多达五次,加上隋朝的回访,两国交流的频繁程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望尘莫及的。

遣隋使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首先它重续了两国中断已久的外交往来,使得两国关系得以恢复并且朝平等外交方向发展,第二,开了日本采取派遣使团,留学生与留学僧直接汲取中国先进文明、改造国家的积极行动的先河。第三,为中日两国交流的鼎盛时期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是后来长期、连续派遣的遣唐使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参考文献:

- [1]《隋书·倭国传》卷81《东夷传》
  - [2][日]藤加礼之助《日中交流两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2)
  - [3]同[1]
  - [4]《日本书纪》卷22《丰御食炊屋姬天皇》转引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9)
  - [5]同[1]
  - [6]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转引自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9)
  - [7]同[1]
  - [8]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1980(4)《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一览表》
  - [9]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9)
  - [10]同[1]
  - [11]同[4]
  - [12]同[4]
- 作者简介 金金花(1978-)女,江苏苏州人 助教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中心,使统治集团众叛亲离,“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sup>[15]</sup><sup>[P35]</sup>。炀帝最终失去了挽救隋王朝的宝贵时机。

总之,启民可汗与隋朝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他对隋朝相当恭顺,这主要是基于隋王朝的强大国力,使得东突厥不得不俯首称臣。随着炀帝推行了一些错误政策,隋朝国势日颓,而东突厥则继续壮大,双方力量对比失衡必然引起双方地位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适应形势的需要,东突厥对隋朝采取了一些敌对政策,这对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的隋王朝无疑于雪上加霜,最终隋王朝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走向了灭亡。

参考文献:

-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王力平.隋朝的边疆经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1).
  - [4]陆庆夫.“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J].北华大学学报,2008,(2).
  - [5]陈寅恪.寒柳堂集[C].北京:三联书店,2001.
  -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作者简介 邱贤文,男,山东梁山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研究方向:隋唐史。